

论苏轼的词学观

杜宏记

(河南大学 成人教育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苏轼的词学观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且有所变化。前期,即通判杭州以前,他认为诗词有别,由于积极的参政意识,他把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文创作上;后期,即通判杭州以后,他开始接触词体,并大量创作词作,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词体的看法,认为诗词一体,开创豪放词风,提倡清丽雅致之词,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词学观。

关键词:苏轼;词学观;诗词一体;豪放;清丽雅致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242(2005)05-0040-03

苏轼的诗文理论与创作实践协调一致,理论深厚丰富,具有独创性,作品不拘一格,多姿多彩。而其词的创作,就文学史而言,和其诗文创作一样,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开一派之风,新天下耳目,但关于词的创作理论,苏轼却言之甚少,并且不成体系。不过,从不成体系的片断论述以及其流传下来的三百余首词作中,我们还是能看出苏轼的词学观点。

在苏轼之前,词坛上存在着两种看法:一是对词的地位的认识。词本起源于歌舞筵席,多抒发男女相思离别之情。北宋初期,文人士子多看不起词,把它看做是佐欢之艳科小技,被后人称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称填词为“呈艺”^{[1](P35)},一代文坛盟主欧阳修称填词为“敢陈薄技,聊佐清欢”^{[2](P84)}。二是对词之雅俗的争论。围绕词之雅俗的争论,虽然在当时没有形成对峙的局面,但雅俗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是存在的,比晏殊稍后的张舜民的《画墁录》中就有这样的记载:“柳三变既以词忤神庙,吏部不放改官。三变不能堪,诣政府。晏公曰:‘闲俊作曲子么?’三变曰:‘只如相公亦作曲子。’公曰:‘殊虽作曲子,不曾道“彩线慵拈拌伊坐”。’柳遂退。”^{[3](P33)}晏殊以自己不曾作俗词而非难柳永,因为他讨厌柳词的浅俗艳冶,而喜欢委婉雅致之作。苏轼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词坛并取得伟大成就的。

据邹同庆、王宗堂两位先生考证,苏轼大量写词是在通判杭州以后。苏轼是熙宁四年(1071)任杭州通判的,也就是说,苏轼在其36岁以后才开始大量写词,在此之前,他仅存词2首^{[4](P3-8)},而在此时苏轼的诗文创作已经达到了圆熟的程度。苏轼的诗、文、词不均衡的创作实践使笔者质疑:苏轼为什么到通判杭州以后才开始大量写词?研究表明,这正是苏轼早期词学观的体现。

苏轼在《与族兄子明书》中说:“记得应举时,见兄能讴歌,甚妙。弟虽不会,然常令人唱,为作词。”^{[5](P1832)}苏轼是嘉祐二年(1057)进京应举的,时年他21岁,这说明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注意歌词了。那时候非常流行的应当是柳永的词,这也是苏轼后来一直不能忘记柳词,总把自己的词同柳词作比较的原因,因为柳永的词在当时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1057—1071),苏轼几乎没有写词,笔者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积极的参政意识。苏轼少时已立宏大抱负,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云:“太夫人尝读《东汉史》,至《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公亦奋厉有当世志。”^{[6](P1411)}时苏轼十岁,已有以东汉直臣范滂自许之意。1057年苏轼的应试成功极大地激发了他的从政热情,在他看来,“致君尧舜,此事何难”^{[7](P198)},于是在嘉祐五年(1060),苏轼以策论25篇献宰相富弼^{[8](P1377)},

收稿日期:2005-07-10

作者简介:杜宏记(1964-),男,河南长葛人,河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教师。

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此后苏轼积极参政的心态进一步发展,并且勇猛执着,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言:“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9](P729)}并在其文中曰:“常欲挺身而许国。”^{[10](P1325)}从中我们可知,苏轼在从政之初有赴汤蹈火、以身许国的强烈愿望,所以此时他所关心的是治国安邦的大计,他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儒家用世的理想中去了,并且用诗文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这种理想。其二,词体观念的影响。由上面的论述可知,苏轼是在词体不尊的情况下登上词坛的,其时,词体被认为是歌舞筵席佐欢的工具,是对男欢女爱、相思离别感情之抒发,正像陈世修所言:“朋僚亲旧,或当燕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俾歌者倚丝竹而歌之,所以娱宾而遣兴也。”^{[11](P27)}所谓诗言志、词言情、诗词有别,而苏轼此时满脑子都是报国之志,从苏轼从政之初的创作实践可知,他选择了庄重的诗文作为言明志向、提出治国之策的最理想的工具。显然,这一时期他几乎没有写词是受当时词体观念的影响。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轼通判杭州以前,认为词和诗是不同的。这是苏轼早期的词学观。

二

熙宁变法,苏轼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他自请外任,通判杭州,后又转徙于密州、徐州、湖州等地方任上。政治上的挫折使苏轼开始接触词这一文学形式,并且在杭州通判任上开始大量写词,其词的创作高峰是在被贬黄州时期。在词的创作实践过程中,苏轼发表了对词体的看法,这些看法虽不是专门系统的论著,但从中可以看出苏轼后期的词学观点,笔者认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以诗的标准评价词,认为诗词一体。他在《答陈季常书》中评价陈季常所赠之词时说:“又惠新词,句句警拔,诗人之雄,非小词也。”^{[12](P34-37)}在《与蔡景繁书》中又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也,得之惊喜。”^{[12](P34-37)}从苏轼评价陈、蔡之词中我们可知,他认为二人之词不同于一般之词作,可以和古人长短句之诗相匹敌,得之惊喜。他对张先的词也进行了评价说:“子野诗笔老健,歌词乃其余波耳。”^{[12](P34-37)}在《祭张子野文》中提及张先一生的文学成就时写道:“清诗绝俗,甚典而丽,搜研物情,刮发幽翳,微词宛转,盖诗之裔。”^{[13](P1943)}他认为词体是诗体的一次新变。张先的词作是与传统的诗相连的。苏轼虽多次批评柳永的词(见下文),但像柳永《八声甘州》词,他却评价很高,说“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此语

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14](P183)}也是以唐诗的标准去评价柳词的。在以诗的标准评价他人之作的同时,他自己也有意识地以诗为词,并且希望别人这样评价他。《王直方诗话》载:“东坡尝以所作小词示无咎、文潜,曰:‘何如少游?’二人皆对曰:‘少游诗似小词,先生小词似诗。’”^{[15](P93)}正因为苏轼以诗的标准去评价词,并且自觉地以诗为词,才使其在词的内容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其二,有意识地开创豪放词风。我们知道苏轼之前的词坛仍以婉约为主流,到了苏轼词风才有大的改观,这是苏轼有意识提倡的结果。苏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12](P34-37)}此信作于苏轼任密州知州时,信中提及词作即他的第一首豪放词《密州出猎》,从文中内容可知,苏轼创作豪放词是有意为之,目的是想改变婉约词一统天下的局面。南宋俞文豹的《吹剑录》也有同样的记载:“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词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16](P39)}柳永词以香艳鄙俗著称,在市民中间影响相当大,“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善讴幕士的回答指出了苏词与柳词完全不同的风格,结果苏轼“为之绝倒”,这是因为此回答正合苏轼之意,即柳永词是纤弱的,俗艳的,他有意识创作的词作慷慨激昂,充满力量,并且这种区别得到了幕士的承认。正由于苏轼有意识地创作与当时词坛不同风格的词作,才使北宋词风在他手中为之一变,从此词坛上婉约、豪放两种词风并行,词风向多元化格局迈进。其三,提倡清丽雅致。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在有意识地创作与柳词不同风格作品的同时,其实也在批评柳永的俗艳,他在创作中对婉约词的雅正也说明了这一点。苏轼婉约词的代表作品如《洞仙歌·冰肌玉骨》、《定风波·常羨人间琢玉郎》、《蝶恋花·花退残红青杏小》、《贺新郎·乳燕飞华屋》等与柳永同类题材的作品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南宋初曾慥《高斋诗话》中记载:“少游自会稽入都见东坡。东坡曰:‘不意别后公却学柳七作词。’少游曰:‘某虽无学,亦不如是。’东坡曰:‘销魂当此际,非柳七语乎?’”在此,苏轼明确提出,反对柳词语言鄙俗的观点,从中亦可以看出秦观也在使词更加雅致,可以说对词的进一步雅化是苏轼及其弟子共同的追求。苏轼在《祭张子野文》中也正面提出

了“典而丽”、“微词宛转”这样的观点,苏轼正是在其词学观的指导下进行创作的,并使其婉约词独具特色,清丽典雅。

由上所述我们可知,苏轼的词学观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并且前后两个时期有所变化。通判杭州以前他认为诗词有别,由于他积极的参政意识,他把文学创作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诗文创上;后期,即通判杭州以后,他开始接触词体,并大量创作词作,在实践的过程中,提出了对词体的看法,形成了自己独具个性的词学观。他的词学观点又反过来指导他的创作实践,使其对词体从内容到风格进行了全面的改革创新,成为词坛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参考文献:

- [1] 叶梦得. 避暑录话:卷上[Z]. 丛书集成初编[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 [2] 欧阳修. 采桑子·词序[A]. 唐圭璋. 全宋词[Z].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3] 张舜民. 画墁录[Z]. 转引胡云翼. 宋词选[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4] 邹同庆,王宗堂. 苏轼词编年校注[M].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5] 苏轼. 与子明兄一首[A]. 苏轼文集:卷六十[Z].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6] 苏辙. 栾城集·后集:卷二十二[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 [7] 苏轼. 沁园春·孤馆灯青[A]. 唐圭璋. 全宋词[Z].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 [8] 苏轼. 上富丞相书[A]. 苏轼文集:卷四十八[Z].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9] 苏轼. 上神宗皇帝书[A]. 苏轼文集:卷二十五[Z].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0] 苏轼. 谢制科启二首[A]. 苏轼文集:卷四十六[Z].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1] 陈世修. 阳春集序[A]. 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Z].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 [12] 陈良运. 中国历代词学论著选[Z].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
- [13] 苏轼. 祭张子野文[A]. 苏轼文集:卷六十三[Z]. 北京:中华书局,1999.
- [14] [宋]赵令峙. 侯鯖录[Z]. 北京:中华书局,2002.
- [15] 郭绍虞. 宋诗话辑佚[Z]. 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6] 俞文豹. 吹剑录全编[Z]. 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

[责任编辑 刘剑涛]

On Sushi's View on Ci

DU Hong - ji

(School of Adult Edu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Henan, China)

Abstract: Sushi's view on ci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different periods. Before he took office in Hangzhou as local official, he believed poetry and ci were different. Due to his awareness of active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his chief energy of literary creation was spent on the composition of poems. Later, after he worked as local official in Hangzhou, he began to expose himself to ci and composed a great deal of ci. In practice, he put forward his own point of view on ci. He believed in the integration of poetry and ci and began to write in a bold and uninhabited style. He advocated fresh and elegant ci, thus forming his unique view of ci.

Key words: View on ci; integration of poetry and ci; bold and uninhabited; fresh and elegant